

青少年“心”疾之痛

近日,有统计表明,中国17岁以下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网瘾、家庭凝聚力下降、心理失调、校园暴力……也让如今的孩子不再那么单纯。

在目前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期的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性格缺陷问题被逐步暴露出来。今天的青少年该如何成长,健全的社会人格如何培养,这些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我们面前。

青少年“心”疾之痛

如今的青少年正处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

纵观历史,几乎每一次的社会转型都会给青少年带来憧憬与机会,但同时也会给他们带来迷茫与失望。在高速发展、变化较多的社会形态里还未成熟的青少年,他们究竟该如何成长?

2010年3月5日,一份有关《青少年现代人格、心理和性健康调研报告》扣动了学者以及家长的心弦。这份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全国青少年健康人格工程课题组,对北京地区学生进行的一对一的访谈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并不严重;高中虽是问题高发阶段,但因高考被掩盖;而进入大学则表现明显。被调查的大学生中有一半对未来没有明确规划;三成与父母不沟通,有四分之一与父母出现矛盾才主动沟通;近一半在社会交往中缺乏安全感;有一半对生活不满意;约两成对现实生活感到空虚不安;六成大学生觉得孤独;有八成认为社会不平等,他们中还有的已发展成愤怒情绪。

参与调查的专家指出,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人格健全已产生负面影响,

也是造成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网瘾和自杀的重要因素。全国政协常委潘贵玉指出:处于生理心智发育过程的青少年,缺乏应对复杂事物的判断和情绪控制能力,很难自觉抵御错误思想和消极情绪侵蚀,容易导致理想信念淡薄、公德缺乏,行为失范,出现厌学愤世、孤僻自闭、心态扭曲、行为逆反,甚至对家庭和社区的极端行为。

今年两会期间,潘贵玉将这份报告作为提案做了提交。

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围城里

“每年,全国大学生的自杀率高达3000~4000人,有人追问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教育太过欠缺。目前中国的大环境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期,社会各种压力大,文化的多元化带来思想迷茫,竞争的压力大导致心理失衡。在如今这个独生子女社会,6+1模式下,他们往往过于自我封闭,不与家人进行沟通,出现问题后没有办法解决,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围城里。”社科院青少所所长杨雄认为,青少年这个阶段,因为人格心智不健全,缺乏对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成为自杀的高峰期。“90后、00后”的一种现象,当独二代子女进入幼儿园,6+1的家庭模式致使全家人对这些孩子们太多太多的关注,而大多数家长仍旧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生理健康,而很少关注到孩子们的心理。而且如今这种过于精细化的教养,将孩子太宝贝,过于物质化,并非好事情。事实证明,往往在这种精细化的培养之下,这些孩子们的生理及心理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以杨雄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们发出疾呼:从未来社会的一种趋势而言,应试教育模式势必将会被良好的人格教育模式所替代。作为家长以

及教育界所要关注的领域,往往应该是培养孩子的控制能力、认知、独立思考、交往、沟通能力,这些要素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应试教育的能力。

健全人格教育成为未来必修课

如果,相关辅导课程诸如生命关爱、自我保护等内容能够写入教材,那么对于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培养将更加重要。这种假设,基于学者们对于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担忧。

“如今的青少年现在看起来没问题,并不等于已经对未来做好了足够的准备。”社会学者韩晓燕将研究课题不仅仅停留于反思,她正在利用一己之力对青少年的健全人格培养采取行动。

作为倡导者和发起人,韩晓燕参与了“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它是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与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青少年与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青少年发展项目。这一项目是在香港“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训计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充分考虑上海本土青少年的成长特点,始自2007年3月,项目以闵行区梅陇中学为试点。经过近三年来的调研及摸索,该课程在引导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积极的认知能力与行动能力、对幸福的感知能力方面已卓有成效。

“‘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让每个孩子幸福、正面地成长,真正体现了教育的本质。”梅陇中学校长乔慧芳感慨,“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个人际互动的过程,是学生的自为建构,是一种积极正面的人生态度的养成,是不断从他人身上吸取优点的学习、生活态度的塑造。”而现在,韩晓燕的心愿是,未来,这由她参与编写的三年制8个能力培养架构的校本教材——《青少年正面成长课程》,能够走进中学德育课本,让健全人格教育成为未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门必修课。

摘自《生活周刊》

自信就是与众不同

瑞士银行中国区主席兼总裁李一,在1988年最初去美国迈阿密大学留学时,学的是体育管理专业。他发现那是“属于富人玩的游戏”,于是在离毕业还有半年时,毅然报考沃顿商学院。

美国沃顿商学院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商学院,李一考得并不轻松,前后面试了三次,仍没结果。最后一次面试,他干脆在考场上直截了当地问主考官:“如果我没有被录取,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很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工作经验。在美国,商学院录取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商务工作经验。”李一作出的反应不是承认自己的不足,或者说“我会如何改变自己的缺点”,而是立刻反驳:“按你们的招生材料所说,沃顿作为世界最优秀的商学院,肩负着培养未来商务

领袖的重任。但世界各国发展很不平衡,如果按你们现在的做法,商务成熟的国家会招生特别多,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一个也不招,这跟沃顿商学院的办学宗旨是自相矛盾的。”

出人意料的是,李一的反驳还得到了主考官的欣赏。面试出来后,招生办主任秘书给李一打了一个电话:“主席对你的印象特别好,说你很自信,与众不同。”后来,在当年52个申请该校的中国学生当中,李一成为唯一被沃顿商学院录取的中国学生。

摘自《开放你的人生》

美国按请柬送彩礼

我在公司驻美国纽约办事处工作半年多,从美国人的结婚请柬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美国人是“现实主义”者。

一天中午,公司聘请的美国翻译斯蒂娜小姐送给我一张结婚请柬,我打开请柬时,一张薄纸翩然落下。我俯身捡起来,上面用褐色的字印着:“非常感谢您参加斯蒂娜和克里斯尔的喜宴,诚心邀请您来分享我们的甜蜜和幸福!我们很贪心,想要得到的礼物很多哦,请看——”下面密密麻麻地列出一长串商品名称,有摄影机、数码相机、厨具套装、水晶花瓶,还有油画、玩具熊、护肤品,甚至有围裙、浴巾,等等。

看到这样一张非常现实的礼物清单,我啼笑皆非。斯蒂娜小姐向我解释说,这是典型美式婚礼的做法。在结婚请柬里附上一份“礼物购买清单”,送给双方新人的亲戚

和亲密的朋友。清单里详细列明了新娘新郎所需要的种种物品,包括产品的品牌、型号、价格,在哪个商场哪个柜台可以买到等详尽的信息。有些眼光挑剔、心细如发的新娘还特别注明了要买哪一种颜色,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自己事先看准了的。

斯蒂娜小姐说现在的美国人都非常接受并且适应了这样的送礼方式。这样的做法有两个好处:第一,清单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新婚夫妇们最需要或最想要的,送给他们绝对可以物尽其用,不会造成闲置和浪费;第二,可以让参加婚礼的亲友们免去绞尽脑汁想送什么礼物好的苦恼,最大程度地为他们节省时间和精力。

我恍然大悟,一边翻来覆去地看那张礼物清单,一边点头感叹。斯蒂娜小姐说可以在清单上挑选自己愿意购买的,在我的经济能力承

意大利的大学考试

都说欧洲的高校“宽进严出”,我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读书经历中,真正领悟到了“严出”的厉害。

意大利大学的上课很宽松,学生可以不去教室,可以不买教材,甚至可以不知道老师是谁,只要有本事通过考试。不过,要过关绝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考试一般分为两部分:口试加笔试。说到口试,真的可以用“闻而生畏”来形容,每次教授说要考口试,底下学生必然一片哗然。口试

是一对一的,教授可以就整个学期所学内容的任何一个知识点发问,然后学生就必须滔滔不绝地讲述。每个学生会被问三四个问题。要是

一下子答不上来,教授也会提醒一下。如果本来是掌握的而一下子没想起来,那那个提醒很有用;如果本来就没掌握过这个知识点,那教授再怎么提醒也没用,而且当教授提醒了很多而学生还是答不上的话,他会渐渐失去耐心,这场考试也就凶多吉少了。一旦口试很糟糕,教授

韩三平补过

2009年9月10日,在《建国大业》全球首映新闻发布会盛典上,第一次扮演蒋介石赢得观众好评的张国立,除了谈戏,还禁不住“质问”影片总导演、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18年前你当导演的时候,那是你的第一部戏吧。18年以后你又导了这么大部戏,你怎么会想到我呢,当年你为什么不找我?”

张国立为什么要“质问”韩三平呢?这还得从两位“大腕儿”成名前的交往说起。1983年,韩三平在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当照明工、做场记的时候,张国立就跟韩三平在一起,张国立属于群众演员,是跑龙套的。他们很谈得来,经常一起在饭馆吃面聊天。韩三平不满足于照明、场记的工作,觉得在制片厂当导演才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张国立听了韩三平的计算,心里自然很高兴,他想:“这下好了,哥们儿要是考上,我以后就不用跑龙套了。”韩三平也承诺张国立,若是自己真的能考上,学成归来第一部戏的男主角一定要找他。

就在那一年的9月,韩三平还真

的如愿以偿,顺利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班。临走之前,张国立还不忘叮嘱韩三平要好好学,将来做一个大导演。

韩三平学成回来,开始筹拍他的第一部电影。张国立跑前跑后地帮着忙活,还挺激动地请韩三平吃了一顿饭,心想这影片中的男主角一定是自己了。然而,令张国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天,韩三平从北京给他打来电话,说为了他的第一部戏能够打响,在北京找好了一个演员。

电话这边的张国立一听心就凉了,要多失望有多失望,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最后他无奈地说了一句“那好吧”,便气愤地摔下了电话。尽管后来韩三平从导演一路做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厂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影集团董事长,张国立在群众演员一路演到男主角、大明星、影帝,但一直以来两人都没有过合作。

2009年春节过后,当韩三平第一次打电话找张国立出演蒋介石的时候,一想到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害”,张国立便断然拒绝,很坚决地说:“我不演,你别找我!一个是我没

有时间,二来我也不像,三来原来你就水过我一回,我就不信你了。”

《建国大业》巨星云集,而且他们都是一个电话“招之即来”,甚至主动请缨。遭到张国立拒绝后,韩三平不仅没有生气,更没有以他中影集团董事长长的身份压他屈服,而是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失信于人的过错。

韩三平亲自带着服装师、化妆师来到张国立的家,动情地对他说:“一来咱们祖国要过六十岁生日了,你作为人民的演员,不应该出来为祖国六十年华诞做什么工作吗?二来你就不能给我个机会,弥补我过去的失信吗?”说着,就让工作人员扒掉了张国立戏的戏服,套上了蒋介石的中山装,并且让化妆师给他上妆。韩三平的真诚最终打动了张国立,他愉快地接受了戏份并不多的“蒋介石”这一角色,并主动提出“为老朋友‘零片酬’出演”。这让韩三平感动得一度哽咽。

如今,《建国大业》这部献礼史诗巨片获得了圆满成功,韩三平收获的不仅仅是成亿成亿的票房,还有无价的友谊。因此,当张国立在影片全球首映典礼上公开“质问”韩三平的时候,韩三平不仅没有惊慌失措,反而笑得那样地灿烂。

摘自《做人与处世》

舍便说:“这鸡的皮色黑里泛紫,还有点铁骨铮铮的样子,不是挺像戏里那个铁面无私的黑包吗?干脆,就叫‘铁公鸡’。”后来,聊城的熏鸡也就得了个“铁公鸡”的名儿。

老舍去美国讲学期间,在纽约有这样一段遭遇:一位亲切、殷勤的老人主动和老舍攀谈,并邀老舍一起散步,聊得颇为愉快。走到一家商店门前,老人突然说要去买一块手表,手头不方便,暂借50美金,回旅馆后立刻奉还,并要老舍在外稍等片刻。老舍不疑有诈,忙拿出钱递给老头,而后接过老头递过来的一个沉甸甸的包裹就进了店门口等。

过了好久,老头不出来,老舍心知不妙,冲进商店一看,老头早已从另一扇门溜走了。老舍急急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是几层破报纸,纸里包着一块砖头。后来,有人问老舍那块“宝砖”怎么处理了,老舍故作认真地说:“我当然还‘珍藏’着啦!一来作个纪念,二来那老头儿再来索要,我好原物奉还啊……”

摘自《教育导报》

我是如何被星探发现的

林青霞

那年我十七,就读台北县私立金陵女中。高中三年级,同学们都在准备大专联考。台湾就那几所大学,人人都想挤进大学之门,功课不理想的我,常感焦虑和迷惘,不知何去何从。

高中快毕业那年,我和李文韵、袁海伦两位同学走在当时最热闹的西门町街头,听见后面两位中年男子正在谈论拍戏的事,我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结果那两位男士就跟着我们,吓得我们飞快地跑上天桥。一位男子抓着跑得较慢的李文韵,说他不要恶意,只是想找我拍戏。问我们要电话,我们也不答应,直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坏人?”他没辙,只好留下名片,请我们打电话给他,名片上写着杨烈。因为还在上学,回家后当然没有回电话。

高中毕业之后我没考上大学,白天没事做,晚上就到台北车站对面的补习班上课。有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张俐仁到“西瓜大王”隔壁的西装店,拿订做好的蓝白花纹喇叭裤。走到街角转弯处,有位矮胖、大肚子、凸眼睛的男人,撞了张俐仁一下,问她要不要拍电影,回头又看了

我一眼,说我也可以。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跟他拿了名片就走了。这个人叫杨琦。

有一天,张俐仁到我家,两个人无聊,偷偷跑到附近的杂货店门口打公共电话给杨琦。互相推托了一阵,最后决定由我来打,我战战兢兢的。

找到杨先生,他说:“你再找四个同学,你们六个人,有一场戏是你们六个美女穿着功夫装,在游泳池边练功夫。”我准备马上挂电话,连说:“不演!不演!”他说:“那你要演什么角色?”我说:“我们刚高中毕业只能演学生。”他说:“有一部学生电影正在招考新人。”于是我留下了电话号码,等他有消息再打给他。过一阵子接到他的电话,约我和张俐仁到咖啡馆,他帮我们填了履历表,带我们到“八十年代”电影公司。办公室有导演宋存寿、郁正春,还有一位谢有谦副导演,他们要我们脱了鞋站起来比高矮。临走与我们约了个试镜的日期。

我们家是传统的山东人家庭,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圈。爸爸、妈妈、哥哥都反对,只有妹妹支持我。母亲为此因病在床三日不起,于是

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张俐仁试镜那天,要我陪她去。植物园里有六七位女生一起试,导演要求我也顺便试一下。没过多久杨琦到家里来,说是导演选中了我做《窗外》的女主角江雁容,我惊讶地说:“怎么可能让我做女主角!我以为是演个有对白的学生。”父母为了保护我,坚决不让我走入复杂的电影圈。我对拍电影充满了好奇心,怎么也不肯放弃。母亲苦口婆心地劝我,甚至拿当年最红的女星林黛和乐蒂做例子,她说:“最红的明星到头来也是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你又何苦……”

我再三保证,进了娱乐圈一定洁身自爱,母亲才勉强答应陪我到电影公司见导演。

记得那天,母亲拿着剧本把所有接吻戏都打了叉,导演连哄带骗地说:“可以借位。”母亲要了《窗外》里演我父母的曹健、钱路家的地址,出了电影公司的门就直奔他们家敲门铃。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佣人说他们不在家。我和母亲在门口等了很久很久,由下午等到黄昏,他们夫妇俩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而开了门。母亲经他们再三保证宋存寿导演是电影圈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这才放心带我回家。

因为还未成年,母亲代我签了生命中第一张合约,片酬新台币一万元,分四次给。

摘自《南方周末》

能把本来是蔬菜的西红柿卖个水果的价钱。潘石屹看完任志强的公开批评信后,马上给任志强写了回信,题目叫《创新是需要勇气的——“二道贩子”给“菜农”的回信》。信中除了对任志强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技术方面的答复外,大谈创新问题。这次“争吵”没有让潘石屹与任志强“反目”。相反,两个房产大腕又于2004年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被媒体称为“鸡蛋(钱)换粮票(合法土地)”的合作。其实,当时拿着“粮票”想换潘石屹手中“鸡蛋”的人不在少数,而潘石屹之所以选择了任志强,也是因为喜欢他的直言不讳。

当外界对他们这种“相见即吵,吵而不散”的合作关系感到惊讶时,潘石屹表示:“任总是个诚信商人,只是不会委婉地表达问题,但我喜欢他的不委婉。交朋友,我就认他这样的人!”

摘自《男视》

名流故事

潘石屹交友“吵而不散”

1993年,潘石屹在海南掘得第一桶金。随即转战北京,以万通地产总经理的身份与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第一次接触。但第一次与任志强的谈判,让潘石屹并不愉快。在他向任志强请教一些房地产的有关问题时,任志强毫不留情地指责潘石屹:“你连什么叫‘七通一平’都不懂,还做什么房地产?”但两人的第一次合作,创造了北京城房地产销售的奇迹,在任志强手中算不上好项目的万通新世界,因潘石屹的包装而一举成名。初次相识,潘石屹领教了任志强的犀利和倔强,也看到了他的智慧和坦诚。就这样,两个处事风格完全不同的人,由此开始了长达近二十年的“对手加朋

友”式的交往。

2000年,潘石屹用“在家办公”这一概念玩活了SOHO现代城。享受着成功喜悦的潘石屹不忘向老朋友任志强炫耀自己的成果。同年2月20日,他邀请任志强到现代城参观。任志强从专业角度询问了许多细节问题,并当面提出了一大堆意见和建议,然后离开了现代城。

让潘石屹没有想到的是,任志强就此次参观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万言书《朋友之间的交流——潘总请我看现代城样板间》,称SOHO这种物业类型“办公不像办公,居住不像居住,属于非牛非马的怪胎”。任志强在信中把自己比作“菜农”,说潘石屹就像个精明的“二道贩子”,总